

潘功胜：扩大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范围

将推出针对企业和个人大额存单

□本报记者 任晓

12月20日，央行副行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潘功胜在第五届财新峰会上称，经济步入新常态，与利率、汇率等金融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和货币政策调控相互作用，在体制机制方面的重要内涵就是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潘功胜介绍，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利率市场的改革，扩大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的范围。目前推出了金融机构同业存单的发行，下一步，将推出针对企业和个人大额存单的发行。

潘功胜表示，经济步入新常态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竞争性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在新常态下，发育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还需依靠市场的力量，具有一个足够深度和广度的市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潘功胜提出，首先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的比重；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缓解企业杠杆率较高的问题，发挥市场在管理方面的优势。同时，在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健全多种所有制，建立多种业态和大中小型机构并存的金



新华社图片

融体系。

潘功胜还强调，要鼓励创新，引导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的健康发展；加快

发展多种形式的消费金融、绿色金融；打造多点支撑的消费增长新格局；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环境。还要主动适

杨伟民：明年国企改革会有重要进展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20日在第五届财新峰会上表示：“现在已经快到年底，马上出台改革方案恐怕有一定难度，但各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基础工作，相信明年会有重要的进展。”

杨伟民表示，本轮改革的一个特点是注重抓顶层设计，有序推进。每年都会确定一批改革重点任务，应该说今年国企改革也是重点任务之一，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出台了国企领导人薪酬和职务消费改革方案，推进了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并提出严格规范央企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

“从小问题入手推进大的改革，是一种改革策略。”杨伟民表示，推进国企改革首先要找准国企和国资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到底有什么需求，因此今年开展了比较大规模的专项调查研究，把问题看清，才容易形成改革的共识。

“有些改革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加快，并不会完全拘泥于事先规划好的时间表，在实际工作中，改革和经济发展是紧密结合的。”杨伟民表示，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压力仍然比较大的情况下，就要更多地推出一些有利于促进增长的改革，比如进一步放宽行政审批，进一步放宽投资领域限制，创新投融资方式，加快设立民营银行，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等，这些都会带动和促进增长。中央已经明确，明年要推出一批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这项工作会加快推进。

阎庆民：积极推进民营银行扩大试点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第五届财新峰会上指出，银监会将积极推进民营银行扩大试点工作，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向县域和乡镇延伸网点和业务。

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如何推进小微金融

服务方面，阎庆民表示，将深化机制改革，探索商业银行“投贷结合”新模式。按照目前《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只能从事存贷业务、不允许对外进行股权投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相关各方可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并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议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适时修改《商业银行法》，探索商业银行“投贷结合”、债权转股权的新模式，提升商业银行支持创新型等高成长

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扩大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按照分项目、分强度、有效地提高跨境资本的程度，逐步实现人民币项目的可兑换。

潘功胜还提出，经济步入新常态后，要求加快健全更加有效的防控机制。他还认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上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风险防范能力较强，银行整体不良率的水平大概在1.1%左右，资本结构风险防范能力也比较强。”

潘功胜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状况。伴随着经济下行，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影子银行等领域的风险正在显露，这些风险的形成，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关。但本质上，仍是粗放经济发展模式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反应。

就金融改革而言，要在宏观审慎的管理框架下，完善政府融资和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结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快建立规范透明的可持续融资机制，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进一步完善不良资产的处置核销机制。

他认为，当前整个社会的融资总量和资金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裕的。“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性小微企业的积极性。

阎庆民认为，相关部门要研究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合意贷款管理模式，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增强银行扩大小微企业贷款能力。银行业要增强“支小助微”服务理念，动员更多营业网点、投入更多资源参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工具，不断创新的网络金融服务模式。

陈文辉：正制定保险业“走出去”监管规则

□本报记者 李超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第五届财新峰会上表示，目前保险业“走出去”有三种方式，监管层对此持积极态度，并密切关注相关风险。保监会正在积极制定监管规则，服务于“走出去”战略。

陈文辉表示，保险业“走出去”既是国家整个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保险业自身的需要，是大势所趋。保险业“走出去”有三种形式，一是比较多地通过出口信用保险的方式，服务于国家战略，近些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以投资的方式，还刚刚开始。截至11月末，保险业境外投资近200亿美元，是很小的份额。三

是通过保险机构设立境外机构的方式“走出去”，主要是在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设立了一些机构。目前，保险业在海外设立的这些保险机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约有31家。此外，还有收购外资保险公司的方式。

陈文辉表示，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海外投资越来越多，金融保险服务也要跟上。监管部门对于保险业通过多种方式“走出去”持积极态度。而在鼓励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相关风险情况。保险业在海外不管是投资购买资产，还是投资去控制一些机构，在法律环境、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和国内有很大差别，希望保险业积极稳妥“走出去”。

陈文辉表示，保监会在积极制定监管规则，以服务于“走出去”战略，正在推动的偿二代建设对于和国际接轨、促进国内保险市场健康发展有积极意义。

此前，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购得伦敦金融城的标志性建筑劳合社大楼，引发行业关注。12月20日，中国平安集团联席首席投资执行官童恺在上述同一场合表示，中国平安集团对于海外投资不会盲目跟风，找到合适的资产类别才会去做。“我们在海外投资选房地产是因为它有很大的规模，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容量比债券市场还大，第二个是久期也长，而且是抗通胀的，另外人的干扰因素相对较少，比较容易管理。”

辜胜阻：证券法修订将重构资本市场生态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12月21日，在《2014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报告》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资本市场的改革面临市场化、透明化、法制化和国际化。全国人大财经委正在主持修订证券法，将通过证券法的修订来重构资本市场生态。

辜胜阻认为，依法治市的核心目标是焕发市场生机和活力。依法治市要转向轻审批、重监管，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要加大违法成本，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加强二级市场监管，优化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应该包括融资与并购的子体系、市场交易子体系、产品业务子体系、市场与机构主体子体系、对外开放子体系、审慎监管子体系。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郭润伟表示，我国资本市场迈入了法治建设新阶段，证监会正在积极推动证券监管转型。证券法的修订、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等一系列基础制度的变革将带动法律制度体系的配套调整，进而推动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向市场化方向更近进一步。

报告显示，国有法人类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本年度首次高于非国有类公司。1523家非国

有法人类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指数均值比国企低一个百分点。报告对2507家上市公司2013年的法律风险指数进行了测评，涵盖了99%的上市公司。测评发现，和2012年相比，2013年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略有下降，风险分布改善明显。金融保险业法律风险指数最高，其次是纺织服装皮毛制造业。信息技术业与传播与文化产业的法律风险指数最低。

理由支持该决议，认定不存在管辖，认为在美国所发生的行为“充其量不过是链条上的一环，而原告所指称的整个证券欺诈骗局都是在外国发展到极端”。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以类似理由维持原判，认为在美国发生的行为并不“构成有关欺诈的核心”。

最高法院受理了上诉，同意发出调卷令，认为问题的核心是，针对在外国交易所进行证券交易的不当行为，外国原告起诉外国被告和美国被告时，1934年《证券交易法》是否为外国原告提供诉因。经审理，最高法院斯卡利亚大法官认为前提是必须涉及在美国股票交易所挂牌证券的购买或出售，或者是在美国境内购买或出售任何证券。由于本案并不涉及美国国内证券交易所所挂牌的任何证券，尽管上诉人主张有效，但其针对的购买的所有方面都发生在美国境外，因此，上诉人没有可以获得救济的主张。据此，最高法院判决维持了驳回上诉人起诉的决定。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供稿，翻译原文见《美国投资者保护经典案例选编》，法律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

刘尚希：新一轮财政改革面临四大风险

在21日举行的北大光华第16届新年论坛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表示，新一轮财政改革面临三个维度和四大风险。其中，能否完成有形手和无形手的结合、协调效率与公平、摆脱转型路径的依赖，以及有效融合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关系到财政乃至经济转型能否顺畅进行。

刘尚希表示，混合经济需要“两只手”协同发挥作用，如何融合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问题需要化解。而对效率与公平的协同，刘尚希指出，机会公平体现在财政就是公共服务，即公共消费。“公共消费与人力资本是相关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是靠私人消费，二是靠公共消费，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他表示，公共消费对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巨大作用，为经济转型能提供动力。

对于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融合，刘尚希指出，文化可以积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又可以激活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都与财政有关，但如何将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有效融合在一起，目前也面临实践和理论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赵静扬）

中西部首家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设立

中西部首家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日前举行项目合作签约，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航空制造、汽车制造和“三农”等领域，项目合作金额50亿元。

渝农商金融租赁是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控股，与重庆两江金融发展等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是中西部首家地方性银行控股、民营参股的混合所有制金融租赁公司，其中有逾60%的股权是农商行，其余30%多股权是民营的。公司注册资本金25亿元，明年融资租赁规模力争突破60亿元，三年内达到300亿元。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正在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重视金融租赁业务发展，三年前中石油在重庆成立了昆仑金融租赁公司，目前租赁业务规模正在往1000亿方向前进，除了渝农商金融租赁外，明年重庆还将成立邮储银行的租赁公司，重庆将拥有三家总部位于重庆的全国性金融租赁公司。他表示，渝农商金融租赁公司要围绕五个方面做好金融服务，一是为“三农”服务；二是服务小微企业；三是服务高科技企业和文化创意类企业；四是服务重大科技创新类产业；五是重视保税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周渝）

专家称国企改革关键在于激发企业活力

在近日举行的 2014年上海国资高峰论坛”上，针对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专家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激发企业活力。

上海股权投资协会理事长陈琦伟表示，从股权投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有丰富的资源和人才，在国民经济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如何将国企已有的资源转化为市场效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挥。新常态下的关键在于“变化”，这意味着必须要创新、必须拥抱市场。国有企业通过和民企的合作，探索建立有国企基因的创新体制，这在未来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作为长期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金融专家，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所所长魏刚认为，如果股权分置改革是证券市场的第一次革命，那么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第二次革命。在混改当中，亟待解决的是股权集中、股东利益不一致和决策科学性三大问题。现在很多国企的国资占比高达七八成，但是控制上市公司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的比重。此外，现在国企的决策链条太长，导致很多地方国企都希望成为竞争性国企，这样就不用政府层层审批，这也是值得管理部门重视的问题。

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领军企业，上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戌源也表示，上港集团通过几年的探索，提出“员工持股计划”而不搞“管理层持股”。现在全公司上下都关注公司发展，公司就是把全员持股作为机制，从而激发活力和动力。

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提出，企业分为商事企业和公共企业。对于商事企业，政府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国有企业不必太多涉足竞争性行业，虽然目前还是大量控制，今后可以逐渐减少。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即公共企业。现在社会上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虽然可以通过市场经济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完全靠市场是不够的，这才是国有资本真正应当发力的地方。（据新华社电）

北京法人单位资产总量突破百万亿元

北京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北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为122.1万亿元，比2008年年末增加57.4万亿元，增长88.8%。

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量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行业：金融业87.3万亿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1.8万亿元，房地产业4.7万亿元，批发和零售业4万亿元。（据新华社电）

■ 美国投资者保护经典案例之十四

莫里森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案

针对没有在美国境内发生的证券交易不当行为，美国法院是否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诉因？本案例给出了答案。本案为澳大利亚投资者针对在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及其他非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及相关美国公司的欺诈行为提出的集团诉讼。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认定，1934年《证券交易法》是否为外国原告提供诉因的前提必须是涉及美国股票交易所挂牌证券的买卖，或是在美国境内买卖任何证券。因此，外国投资者没有可以获得救济的主张。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民银行，本案被上诉人）的普通股（在澳大利亚称作“common stock”）在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和其他外国证券交易所交易，但并没有在美国的任何交易所交易。但国民银行的美国存托凭证（以下简称存托凭证）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存托凭证是一种权利凭证，可以凭此获得国民银行特定数额的普通股。

1998年2月，国民银行收购了家畔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家畔公司，本案另一被上诉人）。家畔公司是一家住房抵押贷款服务公司，

总部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业务是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服务（主要是从事住房抵押贷款收款方面的管理工作），并收取费用。收取费用的权利被称为住房抵押贷款服务权，可以提供可观收入，但各服务权利到底价值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住房抵押贷款是否有可能提前全额偿还（因为还款后就不再需要服务）。家畔公司计算其住房抵押贷款服务权利的现值时，使用了若干估值模式，以考虑提前还款的可能性。家畔公司记录了其资产价值，相关数据出现在国民银行的财务报表上。

1998年至2001年期间，国民银行的年度报告和其他公开文件吹嘘家畔公司业务成功，而其他被上诉人弗兰克·奇库图（国民银行的董事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凯文·雷斯（家畔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和休·哈里斯（家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公开陈述中也是上述说法。2001年7月5日，国民银行宣布减记家畔公司的资产，金额达4.5亿美元；9月3日，再次减记17.5亿美元，导致普通股和存托凭证的价格暴跌。国民银行对7月的减记轻描淡写，对9月的减记则解释如下：没有料到主要利率普遍降低（利

率降低会导致更多的再融资，即住房抵押贷款提前还款增多）；其他财务模式有错误假设；以及商誉受损。

本案的上诉人拉塞尔·莱斯利·欧文、布赖恩赫和杰拉尔丁·西尔弗洛克都是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的普通股。上诉人在2000年和2001年购买了国民银行的普通股。上诉人在纽约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国民银行、家畔公司、奇库图以及家畔公司的三位高管，指控家畔公司、雷斯和哈里斯以及家畔公司的另一位高级主管（也是本案的被上诉人）一同操纵了家畔公司的财务模式，使得提早还款率不切实际的偏低，其目的是使住房抵押贷款服务权的价值看上去比实际的要高。同时，他们还指出，国民银行和奇库图知道2000年7月的欺骗行为，但根本不管。上诉人试图代表外国投资者进行集团诉讼，这些外国投资者在9月减记之前的特定时间段内购买了国民银行普通股。

被上诉人提出动议，要求法院驳回起诉，理由是按照《联邦诉讼程序规则》，法院没有事务管辖权，而且原告未能按照《联邦诉讼程序规则》相关条款规则提出主张。地区法院以第一条